

我在溪口见到的蒋介石

宋 希 濂

1949 年 3 月 22 日，我和白崇禧同机由汉口飞到南京。大约是在 24 日上午 8 时 参谋总长顾祝同约我到他的公馆去。我刚跨进他的会客室，关麟征也跟着到来了。顾祝同对我们两人说：“你们到溪口去见见总裁，我已打电话给空军周总司令（周至柔）要他派飞机送你们去。”（究竟是当时蒋介石有电话给顾祝同叫我们去 还是顾祝同自己的意思要我们去 我一直没有弄明白。）

我和关麟征于是日正午搭乘一架空军运输机到了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学校已经快搬空了 满地都是遗落的器材和杂物。我们费了不少的功夫才找到了学校的教育长胡伟克 这是个一向性情活泼、谈笑风生的空军上校。这次见面，一点兴奋的情绪都没有。他劈头就说：“你们两位老大哥今天到这里来，既没有东西给你们看，也没有东西给你们吃 真是抱歉万分 学校奉命迁移台湾 已经大部搬完了。1937 年秋天我们曾被迫由这里转移到西南去 当时人们虽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但都满怀信心地认为一定会回来的。这一次搬家则完全不同了 大家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绪 谁也不相信会有打回来的一天了。”他叫炊事兵弄

了一些蛋炒饭给我们吃。

约在下午 3 时，我们换乘一架小型的运输机，不到一小时，就飞抵奉化机场。俞济时来迎接我们 同乘一辆小汽车。行驶约半小时就到了溪口，把我们安排在武岭小学楼上的一间房子里。5 时许 蒋经国来邀我们出去散步 我们沿着小溪缓步而行 谈话很少。由于心情沉重 也无心观赏风景。当晚在蒋经国家里吃饭 拉拉杂杂地谈了一些问题 多半是三年来失败的原因 而对前途怎样办 得不出任何的结论。

第二天早晨 7 时 俞济时来说 蒋介石约我们上山去吃早点并谈话。于是我们乘车驶到一片松林前 然后循着两条小石板路走上山去。走了约一千多步便到了蒋介石的住宅。我们在会客室坐下不到 5 分钟 蒋介石进来了 和我们点首寒暄后 便带我们到屋后去走走 出门后不到两百步 便是蒋介石母亲的坟墓 我和关麟征在墓前行了三鞠躬礼 蒋介石回礼并说“谢谢你们”。我们在后山一带眺望了一番 随即回来吃早饭。饭后 我们分别向蒋汇报了属于自己工作范围内及南京方面的一些重要情况。关麟征还谈到李宗仁征求他担任参谋总长职务的问题 向蒋请示。随后蒋介石向我们两人讲了一大段话 大意如下：

蒋说 我们自黄埔建军以来 20 多年的过程中，遭受过许多的挫折，但从未失败到像今天这样严重。抗战胜利后 我们的军事力量 较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大得多 为什么在短短 3 年的时间里 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呢 军事上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我们军队的战斗意志太薄弱了！一个师甚至一个军，一被共军包围 只有几个小时或顶多一天功夫 就被共军完全消灭了。共军行动飘忽 我军常不容易找到它的主力 和它进行决战。一个部队被围 如果指挥官勇敢沉着 选择要点 固守待援 本是我军捕捉和歼灭共军的最好时机。但每当增援部队快要到达的时候 被围部队就已被共军吃光了 结果总是扑了一个空 反而把其他的部队也拖得筋疲力竭 给共军以更多可乘之隙。就这样 使得共产

党的力量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 而我们则日益削弱。抗战期间 日军一个小部队 据守一个据点 我军以数倍乃至十倍的兵力 围攻多日不能克 就是因为日本军队有武士道的精神 他们的官兵视死如归。我们过去统一两广和北伐时期 能以少击众 以一当十 是因官兵具有‘不贪财’、‘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抗战期间 许多部队大体尚能保持这种传统的精神而英勇奋斗。但抗战胜利后，很多部队完全丧失了这种精神 尤以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 大发横财 做生意 买房产 贪女色 骄奢淫逸 腐败堕落 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你们现在带学生（那时关麟征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带部下，首先最要紧的就是要恢复国民革命军的传统精神 才能担负起救亡图存的重大责任。

蒋接着又说，共产党人和追随他们的一些党派及社会上的一些人士 对于我个人及国民政府 攻击诬蔑 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说政府是如何地横征暴敛，说我是如何地有钱，说老百姓对我是如何地痛恨等等，而我们党内也竟然有些人随声附和。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本党 本党同志不知一致团结起来对付它 反而这样离心离德 实在令人痛心之至 你们是我的学生 也是和我共过多年患难的同志 你们万不可轻信旁人对我的诽谤诬蔑 不仅这样 听了这些话 就应该坚决地进行反驳。

上述讲话 是蒋介石这次和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他以相当激动的态度和语调 反复地阐述这些意思 足足讲了半个钟头 我也记不得那许多了。

蒋介石随后谈到外交问题 埋怨美国给他的援助还不够 政策摇摆不定 以致无论军事、政治、经济都大受影响。

最后，蒋介石说：“去年（1948年）我在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 提出不担任总统的职务 我是考虑到这样做有很大的伸缩性 我可以以

党的总裁的地位来担负领导的责任 而可避开正面负责的地位 对党国内来说 对个人来说 都有好处。可以说 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但党内同志尤以一些老同志坚持反对，一定要我担任总统 结果因副总统的竞选问题，弄得党内意见分歧，离心离德，对外对内，都受到很大影响。现在我摆脱了国家行政元首的地位 今后可以总裁身份就重大政策问题表达意见 反而要好得多。”

记得我当时曾参加那次扩大会议 蒋介石在会上发表他不愿担任总统的意见后就退席了。首先提出反对意见、坚决拥蒋登台的是 CC 派的潘公展、萧铮等人。刘公武发言主张接受总裁不任总统的提议 并剖析其利害。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便遭到 CC 派喽罗们气势汹汹的吓骂。戴季陶以元老身份登台发言 他几乎是以教训的口吻斥责主张‘总裁不担任总统为宜’这一派人的意见。他力言就党的历史来说 就目前的局势来说 就党对国家的责任来说 都非蒋先生担任总统不可。这样 拥蒋登台派在会上占了绝对优势。最后 通过一项决议 推张群、吴铁城等 5 人向蒋劝驾，结果是蒋欣然接受，袍笏登场了。可见蒋介石当时提出不担任总统的话 只是一种姿态。1949 年 1 月 22 日蒋介石被迫下野后，恼羞成怒 转过来责怪当时劝驾的人。

蒋介石讲完他原来准备要对我们说的一大篇话以后 稍为停息了一下 喝了几口水 接着对关麟征说：“我离南京前 曾和敬之（何应钦）、墨三（顾祝同）谈过 叫你担任陆军总司令 何以尚未发表 李宗仁要你当参谋总长 这是他们企图分化我们的一种阴谋 你不宜担任。你以任陆军总司令为宜。”蒋介石随即对我说：“如果和谈不成 共军必然渡江 今后西南地区极为重要。现在湖南境内的几个军 于必要时 应叫他们退到湘西去。如共军向宜昌、沙市进攻 你所指挥的部队 可转移到鄂西一带山地，你的司令部以设在恩施为宜，因为那里有飞机场。陈明仁兵团将来可退到芷江、沅陵一带。这些部队，应归你统一指挥，

以巩固川东门户。此事你回到南京，可和顾总长、林次长研究一下，并把我的意见告诉陈明仁和在湖南的几位军长。”

蒋介石说完后站起来打开会客室的门，叫站在门口的一个警卫去找俞济时来。没有几分钟，俞济时就进来了。蒋介石嘱咐他编几本专用密码本交我带去交给在湖南的几位军长。我和关麟征随即向蒋告辞，同俞济时一道下山。约等了半个钟头，俞济时把三本密码本交我带给第十四军军长张际鹏、第七十一军军长熊新民、第一百军军长蒋当翊，并要我对他们说今后可常和总裁直接联系。

上述这些情形，都是蒋介石形式上下野，幕后操纵一切的实际例证。

我们乘一架专机于正午在奉化机场起飞，下午 1 点多钟到了上海。商得飞行员的同意，决定在上海停留一夜，住在金门酒店。晚间上海市政府秘书长陈良来看我们。他原在军政部任军需署署长，和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他善饮酒，会讲笑话，任何一次聚会，有他在场，是不会寂寞的。但这次一见面就唉声叹气地说：“完了完了，我们已被共产党打垮，人心已经完全丧失，国民党的气数快要告终了！”

26 日上午 11 时我们回到了南京，一同去见顾祝同，向他汇报到溪口见蒋经过。谈到关于关麟征任陆军总司令问题时，顾祝同说：“这件事，因行政院于 2 月初即迁往广州，还没有来得及提请通过。不料行政院搬到广州后，孙院长未和国防部商量，就由行政院通过决议，发表了张发奎任陆军总司令，既已造成了这个局面，目前不便马上变更，只有暂缓一个时候再说。”因此，关麟征之任陆军总司令，延到 1949 年 8 月才实现。在当时，陆军总司令一职，并无实权，尚且如此勾心斗角，可见反动派内部的复杂和矛盾重重了。

1949 年 3 月 21 日 7 时，李宗仁在总统府设宴欢送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我也被邀参加了。宴会后，李宗仁在办公室召开了一个为时

仅两小时的重要军事会议。参加者有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张治中、林蔚、萧毅肃（林、萧两人当时都是国防部参谋次长）、汤恩伯（当时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王叔铭（空军副总司令）、刘士毅（总统府军务局长）、关麟征、宋希濂等共 12 人。会议讨论了下列 3 个重要问题：

第一、加强长江防务部署。由萧毅肃报告长江沿岸兵力部署概况后，会议责成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及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命令各部队严密防范共军南渡，并就海军沿江巡逻、空军分区侦察以及交通补给等问题，作了必要的决定。

第二、将驻新疆部队东调。国防部提出，认为战线过长，兵力不敷分配，新疆驻兵将近 10 万，在目前形势下，似无必要，建议将驻新部队的大部分东调。李宗仁、何应钦都表示同意，询张治中意见，张那时是西北军政长官，张巧妙地答复说：“将驻新部队东调，我不反对，但路程遥远，无论步行或车运，均不简单。最好由国防部电召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来京研商后，再作决定。”李宗仁接受张的意见，属国防部照办（其后陶峙岳依据张治中的意旨，一再拒到京、穗开会，形式上接受国防部要驻新部队东调的命令，以要求大量开拨费为借口而拖延时间。随着形势的变化，尤以甘肃全省的解放，新疆部队遂于 9 月间起义投向人民。）

第三、10 个美式装备师的分配。1948 年蒋介石计划在长江以南地区重新编组 150 万至 200 万军队，在各地设立了许多新兵编练司令部。当三大战役的序幕刚揭开时，蒋介石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多方面拼命作垂死的挣扎。他于是年 10 月密派郑介民（国防部次长兼保密局局长，赴华盛顿接洽美援。郑介民在美活动了一个多月，得到魏德迈等人的帮助，获得了 10 个师的美式装备，这是郑介民于 12 月从美国回来后当面告诉我的），这些装备，于二三月间陆续运到了上海及台湾等地。这次会议上，白崇禧提出要求分配给他 4 个师的装备，说他在广西有几个新

兵训练处，在武汉有两个新兵训练处，兵员已大部征足，急待配备武器进行训练。顾祝同则谓现时全国设立的新兵训练处甚多，大家都要求颁发武器，此事必须由国防部按照实际情况统筹配发。白崇禧借此大发牢骚，说：“过去许多好武器，能打仗的部队不发，不能打仗的部队倒发了，结果都送给了共产党。现在局面弄到这个地步，你还想操纵把持吗？”白这番话是对顾祝同说的，实际是指蒋介石、何应钦等。）顾祝同也不甘示弱，立刻进行反驳。一个坚持要 4 个师的装备，一个坚持不肯，相互间顶起嘴来，声音越说越大，意气愈来愈盛，弄得脸红脖子粗，大有互相辱骂甚至动武之势。何应钦看见情形不对，连忙劝他们两人不要争吵，说此事待他仔细研究一下，再请示李代总统决定。一场激烈的争吵，算是平息了。以后听说分给了桂系两个师的美械装备。

最后，李宗仁说了几句勉励的话，就散会了。从这个为时仅两小时的会议里，可以看出一些人高唱和平的假面具以及反动派内部互相撕咬的丑态。

我于和谈代表团飞北平后的第二天离开南京。这次在南京共住了 11 天。在这 11 天中，凡所接触过的人，除张治中对和谈还抱有几分希望和信心之外，其余都是一片悲惨的绝望哀鸣。20 年来为蒋介石所最亲信的参谋次长林蔚，向来是一个说话十分慎重的人，有一天我在他的办公室和他谈到前途未卜时，他摇头叹息地说：“国民党几百万军队，都是 20 多年积蓄起来的精华，现在几乎被共产党完全歼灭了，局势败坏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共产党提出的和谈条件，实际上就是叫我们投降，有什么和谈可言？我自当幕僚以来，很少携带手枪，现在我把手枪随时佩带在身，准备万一被共军抓住，我就自己了结自己。”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大革命北伐时期，我就和他在一个团共事，又是常在一起下棋的棋友，这次一见面就说：“老弟，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那样好的一个局面，想不到只有 3 年功夫，就会失败到这个地步，真是像做

梦一样。他站在空军总部的台阶上指着小营附近的一片新房子说：“这些都是空军几年来盖起来的，有的尚未完工，现在得让共产党来住了！”言下不胜唏嘘感慨。

南京鼓楼至挹江门以北地区称为新住宅区，数以千计的小洋楼形式各异，争奇斗妍，美仑美奂，除一部分属于外国使馆以外，绝大部分都是国民党政府的达官要人们的住宅，而这时已是十室九空了。新街口、花牌楼、夫子庙一带，向来是南京最繁华喧闹的地区，在这一带的许多大旅馆、上等餐馆、酒楼、茶楼，过去真是“车如流水马如龙”，盛极一时，现在则是顾客稀少，门庭冷落。一到傍晚，许多商店已歇业，街上行人屈指可数。我看了这一片凄凉的情景，自然而然地念起元代诗人萨都拉“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的那首词来。我想，现在该是第七代了！

蒋介石的莫斯科之行

孟 东

蒋经国留学苏联被软禁后经多方协调辗转回国已是尽人皆知的事情 而蒋介石的莫斯科之行则少为人知。个中的原因连蒋介石自己也讳莫如深 不愿为外人道 就连他亲定的传记作者毛志诚也只是匆促地数笔带过 加上苏联方面的材料没有解密 人们对蒋介石的这一段经历自然所知甚少。直到 1956 年 由蒋介石亲撰的《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二十年经历纪要》在台湾出版 这一段史实才略有披露 但涉及他苏联之行的文字极为缺少 他在书中说：“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 ”如果遵照苏联的政策 那么“ 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 将不堪设想 ”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 皆不外恺撒之帝国主义 不过改易名称 使人迷惑其间而已。”也许 蒋介石真的忘了他此去负有极为重要的秘密使命 那就是说服苏联政府帮助孙中山实现“ 西北军事计划 ”发动打击北洋军阀政府的南北夹击行动 为进而统一全中国奠定基础。为了赢得苏联的帮助 蒋介石在莫斯科的言行极具“ 左派 ”色彩 而后来的蒋介石则走向了反面 这正是蒋介石不愿提及此事的真正原因。

莫斯科之行的缘起

1923年8月16日孙中山委任蒋介石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秘密率领代表团从上海出发到苏联考察党政军组织。其中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请求苏联支持“西北军事计划”。“西北军事计划”的策划者是孙中山和俄共（布）的一些地方领导人。最早动议可以追溯到1920年9月孙中山与苏共驻上海代表刘江（俄文名字为费奥多罗夫）的一次会谈。当时孙中山在广东联合陈炯明进行革命，很想与中国北方的大国苏联取得联系。会谈中，孙刘二人对将中国南方的革命力量同苏联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联合起来的想法均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刘江还于10月5日把会谈情况汇报给俄共（布）阿穆尔州委员会，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了下文。到了1922年，陈炯明背叛革命，6月16日凌晨炮轰孙中山在广州的总统府。孙中山蒙难之时，蒋介石奉召，不顾自身安危指挥永丰舰英勇作战，深得孙中山的信任。此前，蒋介石拟撰的《对北军作战计划》、《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计划》、《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等文件已令孙中山对其颇有好感。这为孙中山日后选定蒋介石秘访苏联埋下了伏笔。从广东避居上海的孙中山，此时不得不考虑另寻他途。联合苏联的计划再一次涌上心头。9月，孙中山和蒋介石在上海秘密会见苏联军事代表赫克尔将军，表达了依靠苏联援助、在中国西北（新疆或者外蒙）建立革命武装的想法。赫克尔把孙中山的这一设想转告苏联驻华大使越飞。越飞表示非常支持，并慨然允诺给予军火和财力援助。1923年5月1日，越飞从东京转给孙中山一份来自苏联政府的绝密电报，其中有三点主要内容：第一，苏联政府同意并决定提供200万金卢布资助孙中山，用于中国的统一和民族独立行动；第二，苏联政府拟定帮助孙中山在中国北部或者西部省份组建一个相当规模的军事单位，并愿意提供所需的军事物资、军事顾问和教练；第三，希望孙中山“严守秘密”。

为什么要孙中山严守秘密呢？一是因为苏联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想授人以柄；二是苏联和中国国内的其他势力也有联系，在形势不明朗之前，他们不想暴露同孙中山的关系。5月15日，孙中山给苏联外交部和越飞发出了一封绝密电报，电文中称“苏联政府的决定”给我们很大希望，“我们将竭尽全力去实现这些建议”并“将派代表前往莫斯科，以便讨论细节。”当时，孙中山一方面迫于国内的复杂局面，另一方面出于保密以及安全的考虑均不可能亲往苏联。他心中选定的代表就是蒋介石。1923年2月，孙中山重回广州设立大元帅府时，蒋介石就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已是地位显赫的实权人物。

蒋介石对孙中山派他去苏联的决定，自然是诚心服从。7月下旬，蒋介石就在上海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筹备工作。他多次与孙中山、汪精卫、张继等国民党元老商讨代表团的组成和考察计划的细节及内容，还与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马林会面，征询意见，了解情况，以及应该注意的事项。蒋介石对此次苏联之行有着很高的期望，他觉得此行不仅对国家有利，以期根本解决此国事耳，而且对他自己的前途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欣悦之情溢于言表：“为个人计，则甚得也。”（见蒋写于1923年7月23日的日记）

经过再三斟酌之后，孙中山决定将代表团命名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由蒋介石任团长。其他成员有：沈定一、王登云（翻译）、张太雷（中共党员），商人打扮的蒋介石一行于8月18日秘密登上北去的列车，一路颠簸，25日到达满洲里。9月2日抵达莫斯科，路途花费半个多月，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

在莫斯科的活动

到达莫斯科，他们被主人安排在克鲁泡特金街口的一所宾馆中。此宾馆位于莫斯科市中心。安顿下来以后，他们先打扫个人卫生好好睡了

一觉 然后就开始必要的准备工作。

9月6日,他们与苏联方面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出面与他们会谈的是俄共中央书记鲁祖塔克 首先就一般性的问题互相交谈 实际上为了表示尊重 主要是听鲁祖塔克介绍苏共的情况。两个多小时以后 话题总算转移到“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真正关心的问题——“西北军事计划”上来。讨论中虽然谈到如何落实的问题 但并没有深入下去 更谈不到有什么具体的成果。

9月9日下午3点(莫斯科时间)蒋介石一行如约来到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 在拜会军委副主席斯克良斯基、苏联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后开始正式会谈。蒋介石就“西北军事计划”的设想及具体内容做了详细的说明。根据俄方已解密的档案记载,关于这次会谈的《书面报告》中 苏方把“西北军事计划”明确地归纳为两点:一是“在新的地区开展军事行动”二是“按照我们(即苏联)的方式组建中国军队”。此次会谈于7点钟结束 可谓马拉松式的。临分手时 苏方的两位将军微笑着向蒋介石建议 可否以“书面的形式进一步阐明这项计划”。

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 蒋介石除了必要的集体行动以外,一直埋头于书面报告——《西北军事计划意见书》的起草 拟定提纲、改正修饰、校阅修定等 因为孙中山的“西北构想”只有一个大致轮廓 具体方案必须由蒋介石拟议完成。为保证这份书面报告能得到苏方的支持,取得预想的结果 蒋介石的工作相当投入。

10月12日,书面报告终告完成。报告的主要内容有四点:第一,建立军事基地。在与苏联毗邻的中国边境地区选择适当的地点 建成军事基地 以期作为不远的将来与中国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武装斗争的基础。第二 军事基地的选择。希望苏联考虑以库伦(即蒙古共和国现首都乌兰巴托)为进攻北洋军阀政府首都北京的“临时基地”同时以迪化(即今乌鲁木齐)为“永久基地”如果两者取一 提请苏方考

虑以库伦为最后的选择。第三 进行军事准备。这一阶段的时间大约为一年半(其中包括攻占蒙古南部地区)在库伦基地首先做进攻北京的军事准备工作(指建立军校、培训军官、招募士兵、军需装备等)。第四 进攻北京的时间。准备于 1925 年 11 月从蒙古进军华北地区 直取北京 然后从北往南夺取黄河流域、长江流域 直至统一全中国。

10 月 13 日,蒋介石心怀热望把这份洋洋洒洒长达万言的《中国革命之新前途》(正式呈送之前,名为“意见书”后改定为现在的名称)亲自送交苏方。从“意见书”的名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十分自信。但令蒋介石纳闷的是,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苏方没有任何消息。处在焦急与无奈状态之下的蒋介石在屋内时而踱来踱去,时而吞云吐雾,不催吧,长长的等待就像活受煎熬,让人无法忍受。催吧,又怕苏方反感,显得低三下四。他只好向苏方负责接待的人多次暗示,自己“由于神经紧张、过度劳累等原因”想“去疗养院休养两周”。苏方对此居然未置一词。

那么,苏方为什么对自己请来专门探讨中国西北军事问题的客人如此冷淡,又把蒋介石寄予厚望、具有重大意义的军事计划置之不理长达一个月呢?其中的原因一直被历史的尘埃所覆盖。从托洛茨基写给斯大林的“绝密”信件(现存苏共中央党务档案馆里)中,可窥此中的堂奥。实际上,苏联领导层对蒋介石的“意见书”还是比较重视的,它被直接送到了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手中。正在养病的托洛茨基认真阅读了蒋介石的“西北军事计划”。这位当时地位在斯大林之上、苏联军事部门的最高决策者于 11 月 2 日致信斯大林,表示:“我认为,应该极其果断地和坚决地向孙中山和他的代表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现在他们面临着一个很长的准备的时期。军事计划以及向我们提出的纯军事要求,要推迟到欧洲局势明朗和中国完成某些政治准备之后。”斯大林完全同意这一意见。这封信明确表示出苏联领导层将欧洲局势放在

第一位 必须把中国局势纳入整个世界局势中来考虑的想法。托洛茨基信中所指的“欧洲局势”很大程度上是指德国局势。当时德国国内的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如果德国革命能取得彻底胜利 那么“世界革命”的形势将完全改观。相反 如果德国的革命最终以失败告终 那么“世界革命”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就当时的国际局势来说 苏联格外重视欧洲局势也在情理之中 因为德国革命的曙光已然乍现 只是后来的结局是失败)而中国革命的局势依然混沌一片 不仅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 而且也没有自己的军事基地。此情此景 对于求上门来的蒋介石可以说是如坐针毡。也难怪蒋氏几十年后仍然颇多微词。苏联方面对蒋介石“西北军事计划”不热心还有另外一个深层原因 那就是苏联已经把外蒙古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对新疆也垂涎三尺 蒋介石对此多少有些察觉 也是他称苏联为“恺撒之帝国主义”的由来 后来蒋介石曾坚决拒绝在外蒙古独立的协议上签字。

一个月过去了 苏联人才来找度日如年、身心俱疲的蒋介石 通知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准备会见他。蒋介石得到这一消息时 表现得有些紧张 用苏方陪同人员的话说 就是处在一种“神经紧张的状态中”。蒋介石此时此刻很明白 期待已久的谜底就要揭开了。

11月12日下午3时 蒋介石一行应邀前往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参加双方的会谈。在例行的寒暄之后，立即进入正题。斯克良斯基直奔主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详细地讨论了所提方案并得出如下结论 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当务之急 是在国内全力以赴地做好政治准备工作 否则 在现在形势下，一切军事行动都注定会归于失败……。”面带微笑的蒋介石听罢就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楞了片刻 他开始陈述自己的意见 试图能有所改变。他首先强调国民党正在加强自己的政治思想工作 然后提请苏方注意“俄国和中国进行革命运动的条件不同”。中国

国民党的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并开辟自己的军事基地，这样才能使得政治思想工作更有力量。双方就这样争论来争论去，一直持续到下午 5 点半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对此蒋介石十分懊丧。告别时，蒋介石仍没有放弃最后的希望。他请斯克良斯基转交自己写给托洛茨基的一封信。托洛茨基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够尽快接见中国代表团。斯克良斯基愉快地答应了。同时向蒋介石表示一定转达他的意见，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1月27日下午3点，仍在住院治疗的托洛茨基礼貌性地会见了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团。托洛茨基对因病一直没能会见代表团表示歉意，并说自己十分乐意同代表团的每一位成员交谈。随后，托洛茨基就中国的局势和国民党在解放运动中应起的作用，发表了“自己的真诚看法”。他的说法同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可以说斯克良斯基只不过忠实地传达了托氏的意思。蒋介石的亲笔信根本就不可能改变他的固有看法，只不过托洛茨基的谈话更明确和更具体：“国民党的绝大部分注意力应放到宣传工作上，”因为中国革命“需要有广大人民群众 of 的长期坚持不懈的政治准备”，“没有群众基础的武装行动只能是军事冒险，最后难免归于失败”，他提醒蒋介石“苏维埃的经验值得很好借鉴”，办“一份好的报纸胜过一个不好的师团”。他斩钉截铁地总结说，孙中山和“国民党应当立即坚决地、急剧地调整自己的政治方向盘”，“尽快放弃军事冒险，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中国的政治工作上去。”对于托洛茨基的看法，蒋介石表示不能全部接受，因为中国的情况有别于革命前的俄国，“各国的帝国主义者残暴地压制一切革命宣传”，加之南北军阀的不断争斗，局势变换不定，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持和保护，单纯的政治宣传几乎没有生存的余地。为了获取苏方的支持，蒋介石信誓旦旦地表示：“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解放了的“中国能够成为”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一员”。蒋介石急迫心情中表露出来的弦外之音，不

知为什么惹得托洛茨基有些不快 托氏气冲冲地说：“国民党可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从蒙古发起军事行动！”蒋介石闻听此言 无异于晴天霹雷 在托洛茨基看来 蒙古居然不是中国自己的本土。显然 这种探讨不可能有什么结果，持续了一个小时的会见，就这样无疾而终。此后 苏联人再没有同蒋介石讨论过什么“西北军事计划” 寄托着孙中山和蒋介石梦想的“西北军事计划” 最终落得个胎死腹中的结局。

深 长 的 影 响

1923年11月29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12月15日到上海。从上海出发又回到上海 自然无可挑剔 但鉴于此次苏俄之行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 蒋介石自感无颜面对孙中山先生的信赖 可是 这么重大的事情不可能无声无息 被随随便便地搪塞过去 为了交差 也是为了对孙中山先生有所交代 蒋介石把三个月 蒋氏此次的莫斯科之行 除去路途耽搁 在苏联的时间总共有 89天 中的所行所做所思所想 以及所得的资料 熔铸于笔端 写成了一篇总结性文字《游俄报告书》。也许是蒋介石失望过甚 他对自己的心血之作并未重视 只是邮寄给在广州的孙中山先生 足见蒋介石多少有些敷衍塞责 以至于今天再也找不到这份珍贵的资料。孙中山先生收到蒋介石的报告后 多次催促蒋介石赶到广州当面详细汇报。见无法再拖延下去 蒋介石硬着头皮于 1924 年 1 月 16 日到达广州，面见孙中山。此时，距国民党改组之后的一大会议只有区区四天。那么 蒋介石到底向孙中山当面汇报了些什么呢 这只能从侧面来了解了。1924 年 3 月 14 日 蒋介石从浙江奉化写信给廖仲恺 谈到他的莫斯科之行时说：“以弟观察 俄党殊无诚意可言 ”“ 至其对中国之政策 在满、蒙、回、藏诸部皆将为其苏维埃之一 而对中国本部 未始无染指之意 ”。那个时候 蒋介石和廖仲恺同为国民党左派的首领人物 过从甚密 两人间的私人信件所表达的应

该是真情实感。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此种看法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按蒋介石的性格，他的此种说法虽然存在有客观原因，但真正的原因则是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苏联方面对于蒋介石又是如何评价的呢？蒋介石……属于国民党的左派，是最老的党员之一，深受孙中山的信任。同我们很亲近。”他支持我们在中国北方的作战方案。”

那么，苏联方面的评价是从何而来？除了来自中国方面的情报，就是蒋介石在莫斯科的言行了。“西北军事计划”固然是蒋介石莫斯科之行的重中之重，但其他方面的活动同样不可低估。换一句话说，蒋介石在“西北军事计划”上失了分，而在其他地方却得了分。比如在两党关系上，他在同俄共中央书记鲁祖塔克会面时，就曾说过：“了解以中央委员会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是代表团访苏的主要目的之一。鲁氏则回应道：“国民党按其精神与俄共非常接近。”蒋介石同样一语中的：“国民党一向认为俄国共产党是自己的姐妹党。”蒋介石同时还表达了如下愿望：为保持两党之间的密切关系，体现对等关系，国民党也应在莫斯科有自己的常驻代表。另外，蒋介石于 11 月 26 日还出席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的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专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首先由蒋介石作报告。他高度评价共产国际“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它也有领导世界革命运动的责任”。并表示希望：“共产国际能特别注意中国革命，并向中国的革命政党提出坦率的建议。”而国民党正是中国的革命政党，“它肩负着在中国进行革命工作的责任，这是进行世界革命工作的一部分”。蒋介石的这一表态，正中共产国际领导们的下怀。同时，蒋介石对孙中山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的解释则更使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开怀大笑了：“民生主义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在实现民生主义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合法的宣传共产主义原则的工作了。”后来，蒋介石的这一新解释被写进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一个